

我的革命引路人陈展(3) ◆ 王火



上世纪80年代,陈展(左三)陪同有关领导视察上海宝钢

老板娘正生了孩子坐月子。我让母亲去同老板娘套近乎,并在附近店里买了不少礼品给老板和老板娘。然后,同老板谈起心来。我问老板:“认得军法官吗?”老板说:“吃我们这种饭的人,少不了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穿穿针引线,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呢!”他问:“你们有亲属在大牢里?”我点点头。老板说:“最近,到我这儿买人头的人也有。我说的这是重刑、死刑犯,以前比较难,现在形势不紧了办了。只要舍得花金条,人头是可以花钱买的!死罪不死,保释出去也不是不行!”我说:“为什么现在好办了些?”老板说:“兵败如山倒,树倒猢狲散嘛!谁不想趁乱捞一票好走路呀!”我问:“要花多少钱才行?”老板说:“那得看罪大罪小了,不一定,罪轻的花几两金子保出去的也有!”我对老板说:“我有个妹夫,做生意的,冤冤枉枉就给抓了。我母亲与我这次来,就是想看看他,保他出去。我们在南通熟人少,认识了你,真是有缘。要请你帮助呢!”他说得活络:“这种事,要看犯人犯的什么罪。冤枉的跟不冤枉的不一样,罪轻的跟罪重的不一样,好办的与难办的不一样。这军法处的几个军法官,为人也不一样。说实话,办这种事我也怕受牵连。军法审判,弄不好牵连上共产党的事,是要吃卫生丸的!但我看你们母子人不错,能帮忙我一定帮。不过话说在前头,花不起钱是办不了事的!”

我向他打听了军法官的情况。他说处长

是个上校,姓周,最凶,常判人死刑。他认识的一个军法官是个中校,姓蒋,如果案子在蒋法官手里,就好办些。并说,有个死刑犯花钱保走了,蒋法官弄了个其他犯人枪毙了事,巧妙得很。谈到这里,我就将陈展的名字写给了他,托他打听案子在谁手里,犯的罪会怎么判,并希望先让母亲和我探一次监,同陈展见面。老板点头说:“我试试看!”

“买人头!”这种说法我还是第一次听到,那听听到这说法,真是惊心动魄。陈展在死亡威胁之下,我们需要买他的人头,救他!现在希望虽有,估计困难必然还很多。

果然,那旅店老板来说:“糟得很,陈展是个要判死刑枪决的重犯,由周上校亲自审判!蒋法官说这事他插不上手。”

我和母亲像五雷轰顶。老板又说:“探监的事蒋法官说可以试一试,但必须给管牢的弟兄们烧点香。”

“烧香”,就是花钱打点。我和母亲都连声说:“这没问题,一定烧香!管牢的弟兄们和军法官都烧香。”我们又求老板一定要救救陈展,“宁可破财也要救他!你帮了忙,我们一定也重谢!”那老板好像来了点劲,但说:“不是不帮忙,实在是周上校太厉害,他从不收礼品,有人买了礼去他家,他把礼品全甩了出来,名声在外,谁怕他。”

过了一天,老板通知:“今夜九点到牢房探监,会见时间十分钟,要80个袁大头(银元)作烧香费。”为了救陈展,我爽快地付了80银元,并另加了5个给老板作跑腿费。夜里我们探监,终于见到了陈展。他关的是单人小牢房。牢房又潮又暗又脏,霉臭味冲天。陈展上了镣铐,头发蓬松,络腮胡长长的,身体十分瘦弱,衣服邋邋遢遢。他肯定受过重刑,倚墙雕像似的坐着,站不起来,两只眼在黑牢中亮出两点寒光。母亲落泪了!陈展和我们谈了些什么已忘了,但清楚地记得他大叫冤枉,说自己做生意倒了霉,这就是暗示我们他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我则暗示我们是来救他的,特地叫他

“妹夫”,让他明白这种关系。他又说:“我受刑太重,有病,能保外就医就好了!”这是暗示我们设法保他出外就医。不到十分钟,我和母亲就被赶出来了。

绝对想不到的是,我们刚被赶出来,就被军法处长周上校派兵把我们押到他的一间小平房里去了!他穿着棉军衣,剃着光头,吸着香烟,阴森森地问我们的名字,并问是干什么的。我想拿出记者名片,求得自己和母亲的安全,又一考虑,那样不好。既要花钱买人头,别犯忌,说是记者也许他就不敢贪赃枉法了。因此说是做生意的。出乎意外的是,周上校的目的是急于捞钱,所以亲自出马与我们讲价钱了。他说:“陈展要判死刑!他给共匪运送物资,肯定是共党,不承认也无用!我这人判共匪的案从不手软,知道不?”我和母亲连声替陈展喊冤辩解。周上校突然语气平和,说:“陈展的事可大可小,要看你们会不会办事,我家住在东边街上某某号,明晚九点来我家吧!”他看看我,接着说:“就你一人来,也别告诉那旅店老板!来时,别带礼,我是不收礼的!”我就明白了。这伙军法官实际是结成一伙找犯人家属敛钱。周上校以前也许在幕后主持,如今却赤膊上阵自己出面了。他礼是不收的,但金条是收的。

第二天夜里九点钟,我准时去指定地点与周上校谈判。这家伙心很黑,竟提出要五十两金子买陈展的人头,甚至恐吓说:“时间紧迫,要不是时局不好,绝不会跟你打交道。你别迟疑,迟疑了,吃亏的是你们,到时候红笔一勾,来收尸吧!”又说:“出去别乱说,乱说的话,那陈展马上就人头落地了!”

总共去谈了三次,我是软软地同他磨,他也降了点价。我从十多两黄金还价开始,一两二两往上加,他从五十两开始,逐渐降到二十四两(当时,二十四两黄金在上海可以买一幢石库门房子)。最后我们商定:这儿收到金子,那儿就去大牢里接犯人,但要求有铺保作保证,名义是“因病重保外就医,保证随传随

到”。

事情就这么办成了!我立刻回上海找铺保。汪国华找了一家,我们认识上海东新书局的老板夏金松,也具了铺保。我又回南通。陈展的“人头”算是买下来了!母亲当时曾气愤地说:“这个反动政府如果不垮台,真无天理!”

陈展后来在他们的革命回忆录中也谈到这件事。

陈展同志被我们保释回上海后,确是伤病严重,在我们家里养伤并治疗。我家成都南路99弄5号3楼客堂间天花板上有个秘密活动门,掀开后,人可以爬进去躲藏(这门是偶然发现的,我们未告诉别人,故是个秘密躲藏人的地方)。当时如果楼下来了人抓陈展,可以马上让陈展躲进去藏身。陈展伤病稍愈后,有一天,他外出散步时,突然失踪。当时我们推测,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又被特务逮走了,另一种是可能逃到他想去的地方去了。我们很他为担心,又怕被连累,也很怕连累给他做铺保的商家。幸好,国民党反动政府兵败如山倒,风声鹤唳,已顾不上追究这种事。不久,解放军就横渡长江,江南和上海也解放了!上海在1949年5月底解放时,陈展是随大军进入大上海的,他是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驻上海钢铁公司军事特派员、党委书记。我们重逢时那种欢乐是难以言表的。

陈展建国后一直在上海工业战线工作,1978年以后先后担任上海市宝钢工程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石化二期工程副总指挥、市30万吨乙烯领导小组成员,1985年离休,曾任上海市工程咨询中心副董事长,上海市老龄委顾问。他于1996年5月去世,享年82岁。

祝华于建国后在北京先后担任中国花纱布公司总经理、商业部副部长等职务。2011年冬在北京病故,享年102岁。2011年11月我与马识途同在北京开会,曾相约同去他处看望,但噩耗传来,他已去世,真令人遗憾。

(摘自《上海滩》2014年第1期)

母亲邵华

毛新宇



34.叶帅把母亲安顿了下来

是夜,母亲好不容易接通了在总参工程兵部工作的大姨的电话。当时,我母亲的遭遇也传到了军队,但大姨并不清楚外婆也被点名批判了,更不了解外婆的家也被抄了。那时的大姨还没有被卷入运动中,她接了我母亲的电话后,急忙赶到南池子想看个究竟,进门一看傻了眼,能摔的东西都摔了,能砸的东西都砸了。外婆再三叮嘱她一定要把她的父亲刘谦初写的那几十封信找到,她翻了半天,哪还有一点踪影呢,可能都让造反派搜去邀功请赏去了!那是她的父亲用鲜血写成的家书呀!当年瞿秋白看了都伤心落泪,感叹不已,对外婆说:“你要把这些信件一封一封编上号码,好好保存起来,让千秋万代看看一个革命者是如何爱党爱家的。这是真正的铁窗中的诗篇,是一个共产党员不屈不挠精神的真实写照。这些信写出了真正的铁窗风味,我将来可以根据它写成一部部长篇小说。”任弼时同志看过这些信后,也对外婆大发感慨:“谦初同志写的信,和他的为人一样胸怀坦荡,刚直豪爽而又慷慨激昂,的确是一篇篇思想深刻、气魄宏大的精彩文章,就像他那高大魁梧的山东壮汉的体型一样,十分令人尊重和敬仰!”

思齐姨妈想,妈妈在新疆坐牢时那么艰苦那么危险,都把那些信完整无缺地保存了下来,进京后也时常把它们像宝贝一样放在手心里左翻右看,沉浸在深深的思念里。如今,爸爸唯一的遗物、妈妈最珍贵的爱情见证,两个革命者宁死不屈的原始记录,却不翼而飞,自己怎么向妈妈交代呢!她越想越难受,“哇”的一声痛哭着跑出了家门……

这天晚上,我母亲按照董秋斯的建议,给爷爷写了信,诉说了个人的遭遇和苦闷,眼泪打湿了信纸……但是,事情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咫尺天涯,不可逾越。

那时父亲住在301医院。也不知道他是否知道家里的情况。一切都成了未知数。我母亲人住在董秋斯家里,心却飞到了父亲的身

边……她打了几天医院的电话,才幸运地接通了,父亲果然说红卫兵整天堵在医院大门口,叫嚷着说:“只要毛岸青还在医院住着,就不怕邵华沉得住气。”

一个星期过去了,母亲由董秋斯托人转呈给爷爷的信如泥牛入海。董秋斯和外婆估计信件让人故意扣押了。这时外婆考虑到再在董秋斯家住下去,走漏了风声岂不连累了人家一家,于是,又与母亲合计着给周总理写信求救。几天过去了,总理依然没有回音,大家正在焦急地商量怎么办时,总理办公室来人传达了总理的慰问,并说等待通知准备搬家。

母亲听到要搬家,便立即乔装打扮,奔奔自己住在东城的家。只见家里四门大开,家具被砸得稀巴烂,除了衣物胡乱地散落在地上,所有的书籍本子都了无踪迹。最让她痛心疾首的是爷爷写给她的几幅书法、用铅笔在信笺上写的字和她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给爷爷拍摄的照片,还有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签名本,朱德、董必武、谢觉哉、陈毅、叶剑英等许多前辈应她之邀专门为她所作的诗和题词,全都不见了踪影!大伯和父亲在苏联的大量照片、书信,也都不翼而飞了。

8月中旬的一天,母亲告别外婆和董秋斯一家,爬上了军委派来的一辆卡车。驾驶员一路不停地开了西山一个叫董四墓的山脚下,停在了一座没有四邻的院落前。

原来,周总理收到母亲的来信,深感不安,岸英牺牲了,思齐再嫁了,主席就剩下岸青这么一个儿子,若是邵华再有个三长两短,将来向主席怎么交代呀!如果邵华让造反派抓起来,肯定凶多吉少。考虑来考虑去,总理拨通了军事科学院叶剑英院长的电话,指示叶帅要全力以赴,想方设法绝对保证邵华的人身安全。叶帅精心挑选了由军事科学院管辖的这么一个荒无人烟之处,把母亲安顿了下来。

董四墓背靠西山,面向玉泉山,距离城中心三四十公里,周围除军事科学院外,还零零散散地住着几十户人家。董四墓正如它的名字一样荒凉恐怖,西山茂密的森林一直延伸到了院墙外,巨大的树阴早早遮掩了傍晚的阳光。而且这里没有收音机,没有报纸,如果不是暗淡的电灯泡照亮黑夜,不是叶剑英让人隔三岔五地送些食物的话,母亲真像过着野人般的生活。

23.有三条路可走

周祥干过了乡路,独自往塘河塘边去。长风萧萧,河水滔滔,这后塘河十余丈宽,比中塘河宽出许多,流经五乡碾、盛垫桥、福明桥、张斌桥,汇入奉化江。到了河边上,蓦然就看见不远处一座单孔石拱桥,高高耸立于河道稍稍收窄处,两岸的芦苇荆棘蓬蓬密密,时有舟船穿过那两丈余的桥洞。抬头看时,桥洞上方果然就镌着“盛垫桥”三个字。

河畔两岸,绿野开阔;眼前天色潺潺,头上云淡风轻……周祥干兀自默坐许久,忽然之间心神怦然一动。周韩村的韩阿公阿炳,石山弄的三阿公九分阿贵,几乎就是失魂落魄、跌跌撞撞地赶到了横泾村。农人乡民就再无心思去忙什么农事了。上次官军一来就烧了潮青的家,这趟非是要烧了全村不可的。又有人说,按那官府官军的规矩,这趟肯定就是杀男丁,淫妻女,奴儿孙的。

祠堂中个个正襟危坐,陈耆老先自开口,告知众人说,那大军即将杀到的消息,千真万确。一时间,大家的脸色由灰变黑。大难临头,众人这就嗅到了死亡的气息。没有人言语说话,倒是周秀才神色沉着,陈耆老便请秀才先说主张。

事情危急,周祥干也就不多谦让,他说:“事到如今,在下以为,我们可有三条路走。这第一条路,便是我们几个衙门认定的人犯,自己去投案。若事情能够就此平息,乡亲们可免遭官府荼毒,我等即便粉身碎骨,也都认了。”

众人闻言,一起埋头缄默。官府大军劳师动众地杀来,怕不会再是只为他们几个人犯;到了这个时候,大家也都想起那日官军被赶出村子的时候,那干总、把总恶狠狠凶煞煞的灭村之说。大家都说此路不通。

周祥干又说:“这第二条路,与其等着官军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来,我等三村乡亲或可马上逃散,保全性命。”全体村民拉家带口、老老小小的,此议又是不行。

众目所归之下,周祥干缓缓站起身来,只见他脸色红起,眼中炯炯如烛,连光光的额头上也放出光来,接着就听他铿锵说道:“那么,与其坐以待毙,男儿被杀,妻女被淫,家园遭毁,这第三条路,便是我等并拼将性命,聚合乡

亲,作死抵挡!”空气顿时有些凝固了。

张潮青听秀才说出抗拒主张,犹如听着天音,见几位村老一时沉吟,便顾不得唐突,霍地站起:“既是死路一条,我们也不能听凭它官家杀鸡杀鸭般随便宰割!”跟着他又咬牙说道:“豁了命去!与他官府见个高低,也是做人一场!”

俞能贵也一下子蹦起身来,神情狰狞地说道:“宁波也闹了,官军也挡了,这趟我们就反了又如何!我随秀才大哥的!贼娘的,死都不怕,还怕他官军!”

韩阿公三阿公不免神情紧张,此刻又都拿眼睛看着德高望重的陈耆老。陈耆老沉吟良久,终于叹说一句:“事到如今,也是无路可走啊!”

扯旗造反,这且不论;然而聚众抗拒官军,却已经就在这横泾祠堂的斗室之内,定夺议决!室内原本僵硬凝滞的气氛,骤然就被轰地点燃了!

大计既已定夺,事情也就一刻都不能耽误了。热烈集议之下,大家先就正议议决由周祥干、张潮青、俞能贵三人主事,领头三村的乡亲,抗拒官军。张潮青又说,两军对阵,必得号令一出,三人之中,又推秀才周祥干为主。

至于一千村民如何打得过它大队官军,一旦发生死难,孤儿寡母如何照应,还有就是接着往后又该怎么办,诸如此类,一时都未曾议及。只是几个村子的主事者们已经如同歃血为盟——看起来他们真是胆大包天、忘乎所以,实际只是被逼上了梁山。

于此危急时刻,一刻都不能游移耽误了。阿炳说,是否可在村口设置鹿砦拒马。九分说,石山弄人可以尽数上山与之周旋。周祥干道:“此两途最终都不免受困被剿。据闻确凿消息,官军千多步兵,百十号骑兵,将于村北的官道与后塘河,分两路奔杀而来。如今之计,唯有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设伏突击,才是办法!”虽然从未经历战事,可是看书读史,常理毕竟也知晓一些的。张潮青、俞能贵击节赞成。然后大家随周祥干一起来到盛垫桥:“就在这里!”

走到桥边,张潮青指着那二丈余的桥洞说,在此打桩,拦住它官府部队!

鄞变一八五二



徐 姓 氏